

從影像反思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記憶政治

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」紀錄片座談大綱

向歷史掘墓的好男好女

文／謝金蓉

一，〈幌馬車之歌〉的時代背景與作品定位

一九八八年，藍博洲在《人間》雜誌發表〈幌馬車之歌〉，震動了台灣的文藝知識分子，鍾理和同父異母哥哥鍾浩東與其妻蔣碧玉的白色恐怖受難經歷，開啓了藍氏報告文學的首章。一九八九年，〈幌馬車之歌〉獲得文學獎，獲選入年度小說。

〈幌馬車之歌〉以蔣碧玉、李南鋒、戴傳李等受難者的受訪證言爲主體，直接陳述歷史，被評論家定位爲報告文學文體，但全篇又穿插安全局、軍聞社、保安司令部發言人等的「對話」，再以鍾理和的日記作爲貫穿小說各個章節的開頭引言，以小說的形式行記錄之實，以虛構的敘述結構，連貫真實的證言，可以說是一部用小說來發表的文字紀錄片。

在歷史尚未解禁的年代，〈幌馬車之歌〉以虛實並用的手法介紹一連串的禁忌人物登場，它的成就是畫時代的。不過，於今來看，必須特別注意的是，整個白色恐怖的揭密工作是從一篇小說作爲發端，〈幌馬車之歌〉告訴我們的歷史，夠多、夠清楚嗎？

二，向歷史掘墓的好男好女

進入九〇年代之後，藍博洲以驚人的文字產量，揭露了四六事件、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歷史證言，被稱爲異議史家、民眾史家。

他的兩部紀錄片作品——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」（1995）、「台灣思想起」四十集（TVBS 播出，1997），也是以歷史的見證爲主旨，在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」裡，白色恐怖受害者許金玉、羅坤春、林昭明等向攝影機陳述他們的經歷，比起鍾浩東、郭琇琮、呂赫若等人的受難傳奇，他們有如二線人物，除了林書揚之外，影片受訪人的事蹟過去幾乎未見披露。

嚴格說來，文字出版足以出土這批二線人物的生命史，在這部紀錄片裡，多數時候受訪人的拍攝背景單一，像是保持坐姿的許金玉和林書揚，在苗栗客家庄重溫往事的老人，或者著力於原住民自決的泰雅族林昭明，紀錄片幾乎僅記錄他們的發言而已，就紀錄片的功能而言，〈我們為什麼不歌唱〉大部分的內容其實文字出版足以表達，比較特別的影像紀錄並不多，例如：

——曾梅蘭在六張犁找到兩百零一座墓碑

——撿骨師在六張犁尋找黃逢開的屍骨，黃逢開被槍決時僅二十七歲，撿骨師說：這麼年輕的屍骨，再過幾年就什麼也找不到了！撿骨師撿起一片，說道：「這一片是頭骨」，尋獲的骨頭鋪在報紙上，家屬收起來，放入塑膠袋「打包」，結束這趟掘墓尋骨的工作

——羅坤春與曾永賢秘密會面的地點；農民謝發樹庇護流亡黨人，尋找當年的藏匿處

——黎明華所導覽的東區服務隊現址

三，迷與醜——撥開歷史迷霧，尋找咖啡時光

每回我總嘆氣，侯孝說出來的電影，比他拍出來的，好看太多了。聽他運鏡，我拜託拜託他，千萬把〈好男好女〉拍出這股醜味好不好……

後來看到毛片，我大失所望，還是這麼冷靜，一點醜味也沒有。

……敏銳的詹宏志也感覺到這點，他的說法是，片子太乾淨了。

——《好男好女：侯孝賢拍片筆記》，朱天文編著，1995

紀錄片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」是劇情片「好男好女」拍攝期間的副產品，「好男好女」的企圖心更大，以戲中戲、現實、過去三階段的時空交錯進行，戲中戲的片名也叫作〈好男好女〉，取材自小說〈幌馬車之歌〉所出土的「真人真事」。紀錄片留下蔣碧玉的身影與葬禮，目的在於解開歷史迷霧；劇情片則是由演員伊能靜、林強飾演蔣碧玉、鍾浩東夫婦，藍博洲親自演蕭道應，企圖由女主角當下的意識和她所想像的歷史戲，摻攪而溢出醜味，是一次相當具有挑戰的嘗試，比起以虛構人物為主角的「悲情城市」，「好男好女」的難度更高。

解迷與尋醜，這兩條線路幾乎主導了自〈幌馬車之歌〉刊出後近二十年來，本土文藝創作者的基調，也影響了後進者的摸索——到底，應該像藍博洲一樣繼續向歷史掘墓，翻找更多被湮沒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生命史；抑或跟隨侯孝賢、朱天文的感性尋醜，活在當下而與江文也尋求交通，像電影「咖啡時光」裡的自由作家陽子，尋訪江文也當年流連的達特咖啡店？

解迷與尋醜，兩者並不相悖，重要的是自己該站在什麼位置回顧歷史、活在當下，這是侯孝賢、朱天文、藍博洲等創作者給予我的啟發。在個人粗略的新聞採訪與寫作之路上，圍繞著許強、郭琇琮、呂赫若、蕭道應等人物的點滴經常徘徊在腦海，每有一點出土（以近三個月為例，《呂赫若日記》與《蕭道應紀念文集》接連出版）便如獲寶物，自己也很納悶：這些人的重要性，是不是被小說和電影放大太多倍了？而小說和電影並沒有告訴我們足夠的歷史。仍然不夠清楚的歷史，該如何訴說？由誰來說呢？

謝金蓉簡歷 jin914@seed.net.tw

1992-1998 《新新聞周刊》文化記者、主編

1998-2000 新新聞文化事業出版部副總編輯

2004- 《新新聞周報》特約主編、第七屆台北文學獎寫作年金得主